

八股新论

金克木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第二十三名

試

○

○

舉

印卷官禮部儀制清吏司

員外郎加一

三

联

精

选

Humanities

《八股新论》

金克木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八股新论 / 金克木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8

(三联精选)

ISBN 978-7-108-05844-7

I. ①八… II. ①金… III. ①八股文—研究
IV. ① H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3407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装帧设计 鲁明静

责任印制 宋 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4.75

字 数 90 千字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出版说明

金克木先生 1991 年应中华书局之邀，与启功、张中行二位先生一起，共同撰著了《说八股》一书，为文坛合作之佳话。金先生在其中单独成文《八股新论》，篇幅精简，文字通脱，对八股的源流、体式、功能和历史功过做了既透彻深入又亲切可感的疏解，实为作者体大思精的文章佳构。三联书店 2011 年版《金克木集》将此文收入第五卷。

时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成立八十五周年之际，谨将此文连同作者其余七篇相关文章合编一册，书名仍为《八股新论》，收入新编文丛“三联精选”之中，以纪念金克木先生与三联书店多年的合作情谊。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 年 2 月

出版说明

引 子 1

八股评罪 5

八股文“体” 26

八股文“心” 55

《四书》显“晦” 82

附 录

八股文前八股文 109

八股开篇 119

陈年日记一则 121

高鹗的八股文 124

父子对话：八股文学 133

奇书的平凡 139

闲谈“八股文学史” 142

引 子

在下忽然不顾衰年，不惜余力，作文论八股，真是何苦来哉！不免照八股格式先“破题”。

问：何为而作此论也？

答：不是作挽歌，是作悼辞。无挽留之意，有哀悼之情。悼两千几百年来“士”的读书应考做官的道路与八股同亡，五百年间文体传统结晶木乃伊随八股化为乌有。多少年，多少人，“枉抛心力作词人”。今天，八股之名，知道的人不少；八股之文，见过的人只怕不多了。考试虽存，大非昔比。科举与文体虽是学者常识，未必为一般人注意。何妨略说，分作两股。

春秋时代，诸侯争霸，招贤纳士，出现了一条不由血统或战争而能参加统治集团的做官道路。走这条路的人中名声最大的是孔子。他周游列国，提供咨询，传授门徒，著书立说，尊为圣人。战国时代，这些人在政治上文化上声势浩大，最后一名是秦始皇的丞相李斯，辅佐皇帝统一天下。秦代统一文字，设立官学（博士官，“以吏为师”），堵塞了游学游说的进身之路。西汉时代，保留博士传授官定“经”书。另辟非由血统或军功

而能做官的道路,即地方名流推荐与皇帝当场面试相结合的“选举”。殿试献策最有名的是叔孙通、贾谊、董仲舒。东汉时代,民间讲学之风大盛。做成或做不成官的读书人成群结队议论政治,和掌权太监进行激烈斗争。魏晋六朝之后,唐代规定文人单由科举考试做官。虽是单行线,仍须大官推荐,未灭汉代“两结合”余风。宋元明清这一千年内读书做官的人便只有应考的一条路了。考试科目中,历代都保留了春秋战国和汉代的廷试对策。可是长期都不重视,徒有虚文。所重视的是另外科目,出题作诗文。唐代重诗,宋代重文。宋代开始考“经义”,摘《五经》句出题,要求考生作文解说。南宋朱熹编订《四书集注》,将《论语》《孟子》两书和《礼记》中《大学》《中庸》两文合编加注。元代开始考“四书义”,从《四书》中摘出考题而以朱《注》为解说标准。明代确立文体,就是通称的八股文。考试科目不是只有八股。做官道路也不是只有应考。在清朝做官就有血统、军功、科举、捐纳、保荐这几条路,都是古已有之的。

汉文文体的发展和这条读书做官道路密切有关。汉赋、唐诗、宋文都为做官扬名所必需。八股文体兼骈散,继承了战国策士的言论,汉魏六朝的赋,唐宋的文,而以《四书》为模范。分析八股文体若追溯本源就差不多要涉及全部汉文文体传统。八股文结构不是仅有八“股”。它的开头是“破题”,接下去是“小讲”,随后有八“股”分作四对的“比”。“起比”“中

比”“后比”加上“束股”一对。各“比”之间还有连接承转的话。“比”后是结语。全篇本来只有二三百字解说《四书》义，体式定后越来越长。清朝先定五百字，后限七百字。全篇文意不许越出题外。但出题是《四书》句，一句、半句、几句、全章都可以，上下不连气的“截搭题”也可以，所以不许“犯上”“犯下”，又不能不照应小题目的上下文。结构之外，传统各种文体有不少特点在八股文里集中了，凝固了，于是僵化了，成为木乃伊，不能变化发展，又捆在《四书》上不能动，所以一废科举便消灭得尸骨无存了。

以上两点悼意化为下面四篇文章。

第一篇是《八股评罪》。八股有功没有？不成问题，没有。八股有罪没有？不成问题，有。问题在于有什么罪？有多大罪？我不会作评价，也不会作断语，只是考察一番，并举八股片断为例。例子是清代诗人王渔洋（士禎）和袁随园（枚）的。

关于八股本身，只作为文学现象来考察。有两篇，分论《八股文“体”》和《八股文“心”》。这可以算是两股。从两方面说一些不知有没有人讲过的话。举的片断八股的例子是明代汤若士（显祖）、徐文长（渭）和清代尤西堂（侗）、高兰墅（鹗）的，兼说“红楼外史”高君的词以为对照。还引《论语》一章以见八股结构之源。

八股与《四书》不可分。《四书》不但出八股之题，而且

出八股之体。八股文又叫做“四书文”。《四书》是朱晦庵（熹）的“述而不作”的著作。元明清五百多年间这是“显学”，但又可以说是“晦学”，因为一者是晦庵之学，二者是明受尊崇，实作招牌，真意不明，以致八股一废，晦庵之学随之而晦。究竟《四书》和八股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的实际意义或功能或体式是什么？也许还是晦而不显，需要费力探索。因此，最后一篇是《〈四书〉显“晦”》。前文引过《论语》中一章。这里再引《孟子》的片断。为说明八股实有和皇帝对话的对策性质，引了清顺治六年状元刘克猷（大壮）的殿试考卷答“策问”中的精彩部分。由此可见从《四书》到八股的“一以贯之”。

以“八股”为题，始于“评罪”，中辨“体”“心”，终于“显晦”，取名为“论”，实是闲谈。能力有限，又不能去图书馆查考群籍，八股取材多出于清梁章钜的《制艺丛话》，更受限制。不过，不同于八股的只敷衍旧义，而对少量“取样”加以剖析，说是“新论”也许还可以。这两个字又是抄汉代桓谭的书名，用来作题目也合乎八股题必引现成文句的规定。我当然决不是妄自比拟古人，也未见过那部失传的古书，这想必是无需声明的。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八股评罪

八股定罪已久，还有什么可以评说？

自从本世纪初清朝廷废科举以后，八股文销声匿迹。明清两代五百年间汗牛充栋的八股文选本和《闾墨》（考卷刊印本）以及为作八股用的入门书参考书忽然之间消灭干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更是“臭名远扬”，“永世不得翻身”了。何必再提？

八股文从前称为“时文”。名家的文集都不收容。刻印“时文”稿也另作一集。乾隆皇帝钦定官修的《四库全书》只将明朝的八股文选出一集作为标本，其他一概不收。可见最高主考皇帝并不认为八股文是上等文学，名义上尊崇，实际上鄙视。奉诏编这部选集的方苞是清朝“时文”一大家，又是“古文”一大家，桐城派的开山祖师。连他也不重视八股。在搜罗他的集外文的《方望溪遗集》中有篇《李雨苍时文序》，开头便说：“余自始应举即不喜为时文，以授生徒强而为之，实自惜心力之失所注措也。每见诸生家专治时文者，辄少之（瞧他不起），其脱籍于诸生而仍如此者尤心非焉（嘴里不说，心里不赞成）。”他还在别的文中鄙薄八股，明显认为这只是敲门砖，中试“脱籍”

做了官以后就该抛弃。此外对八股不满甚至声讨者更多。大学者如顾炎武，在学术著作《日知录》中，大文人如吴敬梓，在小说《儒林外史》中，各自发表了不同的谴责。由此可见，八股的地位表面上极高，实际上极低，所以一旦不用于考试做官立刻便成废物。唐朝人应考的诗，宋朝人应考的论，还能流传，与八股大不相同。八股已成垃圾，还有什么可说？

然而在五百多年的长时期内，无数读书文人为学作八股而花费无穷心力，这岂不是一大文化现象？读文学作品当然选高而弃低，研究文学史都要“细大不捐”见其全貌，以免依据片面便下断语不能恰当。八股本是元朝和明初开始定为考试科目的“四书文”，溯源于宋朝的“经义”考试。创始者的文章据说是政治家、古文家王安石的。为什么八股要请他为祖师？“拗相公”王老先生确曾讲过经义，有新说，但留下的“经义”文大概是托名代撰的。陈言老套的八股为什么要以他为旗帜来标榜？八股是不是“形亡而神在”（借尸还魂）？原形不出世，“元神”未必散，岂可置之不理？

要追查，首先要论罪名。不是洗刷而是定罪量刑。一笔抹杀不是理解的办法而且往往没有实效，甚至适得其反。

八股的罪看来不过这么几条。

一是限制了思想，其实只是限制读书人的思想，限不住文盲。指定《四书》加朱熹的《集注》为标准，不许“越雷池

一步”。于是别的书都不读，不知“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卖新科利器。”（徐灵胎《道情》）于是思想不出《四书》，祖师只有朱熹，思想都僵化了。

二是糟蹋了文学，其实糟蹋的是书本上的文学，毁不了口头流传的文学。读书人钻研学习刻板定式的八股文加上同样刻板定式的试帖诗，头脑僵化，不仅不会灵活思考，而且不会写文章。八股文只要调子对，不管语句是否通顺。“天地者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实衷怀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元后即帝王之天子。苍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亿兆民中已非一人矣。……”（见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丛话》亦引）这两股文何尝不对仗工稳音调铿锵？这样堆砌相同词句作花架子，摆气势派头，岂不是“干净彻底全部”的废话？这样的“时文”占了读书人的时间精力，占了文学的上风，诗词歌赋论文小说由八股文人去作，还能有八股老套以外的新发展？

三是害了朝廷，毁了国家。以八股取士，中进士点状元的都是书呆子，会作破题、小讲、对偶，不懂治国安邦，背诵经书，不知实际。朝廷用这样的人做官，怎么能办好事？对外不能抵抗外族，让皇帝安稳坐朝；对内不能振兴经济，让朝廷多收赋税；朝廷用的都是这种书呆子，江山怎么坐得稳？老百姓更不必说，在这样的大小官儿的治下，只有倒霉受苦，有冤

无处诉。翻来覆去背诵模仿《四书》和朱《注》文句，一心揣摩皇帝恩威，考官好恶，当时风气，文章作不通，官又怎么当得好？“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徐灵胎《道情》）

一伤思想，二害文学，三毁国家，八股的罪名不外这样三项吧？这都是事实。几乎是从有八股以来就有反对者。他们的说法未必有多少在这以外。现在八股已经“盖棺”，这也成为“定论”，并没有错，用不着翻案。但是我们不应停留在这里。当八股“在朝”行时之际，指出缺点，说它坏话，一针见血，入木三分，都好。当八股已经“入土”或“火化”之时，作“史臣曰”的论断就需要全面一点，客观一点。仍然持一面之词就不妥当而且也不是前进一步深入一层了。判罪之后就要量刑，那就不应该是一律“罪该万死”，“死有余辜”了。不妨摒除意气考察一下八股的罪行究竟有多大。

首先是八股亡国论。这个罪名太大，帽子不合头。文章和书本和以读书求做官的人都没有那么大的本领。中国历代社会中的思想文化不是占人口中极少数的识字读书人能包办的，不是更稀少的哲学家思想家能全部代表的。八股文不过是上骗下、下骗上的蒙混人的工具，负担得了那么大的责任吗？八股四书文起于元朝，是由蒙族皇帝批准推行的；成于明朝，是中期才完成的；以后到清朝，由满族皇帝制定程式体裁，还陆续

有小的变动；到道光以后就衰微了。光绪时期，越来越多的读书人无心做八股了，取消八股是顺理成章的了。蒙族、满族以及明朝汉族的皇帝中有哪一位是会作八股的？仅仅是乾隆皇帝喜欢舞文弄墨以配合或粉饰他的“十大武功”，下诏出了些主意，那也是给人家去做，和自己不相干的。对国家兴亡第一要负责的不是皇帝吗？他们都不是八股文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决不当把匹夫之责和帝王将相之责等量齐观混为一谈。

明朝八股兴盛，汉族朝廷亡于满族，所以明清之际的读书人把明亡的罪责一归之于王阳明（守仁）的讲“良知”的哲学，二归之于八股文章。读书人总喜欢过于看重书本，不读书人又对书本有神秘感，所以书本不是被吹捧得过火，便是被咒骂得难听。书本力量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是有限度的。不是书本自身起作用，更不会突然见效。明朝之亡是亡于皇帝太监的腐败。崇祯皇帝吊死于煤山，他自己应负最大责任，不能怪八股。洪武、永乐两位开国皇帝是雄才大略得天下，残暴统治定天下，不是仗八股文。永乐皇帝的得力军师是和尚姚广孝，与八股无关。不上朝而修定陵的万历，刚愎自用又多疑残杀大將的崇祯，游江南的风流少年天子正德，信任乳母客氏及其“对食”配偶太监魏忠贤的天启，这些皇帝和另一些多半年纪轻轻只知玩乐把国家事推给太监和大臣的皇帝之中，有哪一个会作八股的？恐怕连《四书》也不会读。刘瑾、魏忠贤等掌权太监未

必认得多少字。严嵩和张居正等大臣会作八股，他们为自己和为朝廷搜刮老百姓的本领是八股教的吗？《四书》说“省刑罚，薄税敛”（《孟子·梁惠王》），他们照办了吗？明朝之亡是亡于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起义。这些起义军人不但不会作八股而且是痛恨八股文人的，因为文人是做官的胚子，欺压农民的预备队和啦啦队。起义军中的文人如牛金星、宋献策也不是八股好手，未必奉《四书》为宝典。明朝之亡又亡于满清。入关的摄政王多尔衮，率兵南下灭明屠城占地的豫亲王多铎，帮助清兵得天下的吴三桂、洪承畴、范文程，哪一个八股文人？反过来，八股文人中效忠皇帝死而不悔的书呆子倒不少。例如拼去十族来多管朱家皇帝的家务事的方孝孺，谏皇帝而惨死的杨继盛、杨涟、左光斗以至于清朝的大时文家大古文家方苞都是。方望溪（苞）老先生只因文字狱中犯人戴名世的《南山集》内有一个方孝标被认为是他而下狱，几乎处死。皇帝知道了，不但不平反，反而“加恩免死”，叫他到“旗下”去给满人当奴隶。他能教王子念汉文书，却又好多嘴管闲事，得罪了几位王爷。幸而皇帝知道他的为人，免了奴籍，还给官做。他仍然“直言敢谏”乱出主意，终于归老林下，算是逃得了一个“善终”。究竟他对于乾隆朝的治或乱起过什么作用？不过是一句评语：呆里呆气好多讲话，不过还是为皇上好，是忠君的。如此而已。这些俱见全祖望给方苞作的神道碑，大体事实不会假的，否则

怎么能堂而皇之在墓前竖碑。何况全祖望是黄宗羲一派的史学家？方苞命途坎坷，除文章外并无什么建树，对清朝的武功和内忧外患说不上影响。

总而言之，八股对国家社会有害，害处首先在读书人身上，对于不读书不识字的人，占多数的人民全体，为害没有那么大。八股的兴盛时期，起作用大的年代，不过是从明中期（成化、弘治）到清中期（道光、咸丰），即十五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四百年左右，明清之间还中断了一段。这时期民间文学发达，反八股的一部分文人异常活跃逐渐形成了极有力的新思想、新风气。这已是现在人的常识就不必多说了。“老门生三世报恩”，“钝秀才一朝交泰”，写的不就是这时期的八股书生，不就是描绘他们的文学作品吗？朝廷皇族的更迭不等于国家的兴亡和社会的变革，书本及文人也不等于国家与社会，这还用说明吗？用不着了吧？若是国家兴亡由于八股，那么，清末八股消灭了，中国怎么不见兴盛起来呢？其影响所及不过是文事而已。对于其他只可能有间接影响。

八股误国论的又一方面是说朝廷以八股取士做官以致大小官员都是书呆子，所以皇帝亡国社会退化。这也有事实为凭，但说法很不确切。由八股考取做官的并不全是书呆子。忠臣奸臣能干人废物都有。八股只是敲门砖，不能限制人做官以后抛弃八股发展才能。方苞说过，唐宋古文八家中除苏洵一人以

外都是早考中做官的，所以可以在做官以后抛弃时文作古文。（苏洵是苏东坡的父亲。《三字经》中说“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这种说法还不能减轻多少八股之罪，因为毕竟是读《四书》学八股的书呆子比聪明人多，做不成官的比做成官的多，坏人和无用之人比好人和能干人多，用八股敲开朝廷之门以后发展才能的人少。要定罪大小需要考察中国两千多年来帝王将相和道府州县“父母官”统治机制及其运转的实际。为什么明清几百年乃至秦以来两千多年用书呆子废物做官的多，而居然一代又一代能机制不变，照样维持统治，而且农民起义成功以后还是照样不改变机制只换人呢？不说原理，只看事实。原理普遍适用，事实是中国自有特色，非罗马帝国可比。

从秦始皇到清宣统，高踞统治全国宝座的帝王将相并不是科举出身，像明朝张居正那样的极少，这不必说。重要的是直接治民的地方官。这些官中糊涂的多，精明的少，能为老百姓办点好事如开封府尹包拯和海瑞、况钟的“清官”更稀罕，但是统治仍旧能长期巩固，为什么？有人埋怨中国老百姓太老实，软弱可欺，有人以为由于孔子老子教导了文盲而其他圣贤如墨子等没起作用。不知那些只靠耳闻目睹和传说及习惯生活的不识字人并不知道圣经贤传那一套。把责任推到受害人一边，不说是为害人者开脱，至少是不合事实。官是只知捞钱，对上“多磕头，少说话”，对下多讲话少办事的，例外很少。统治不能